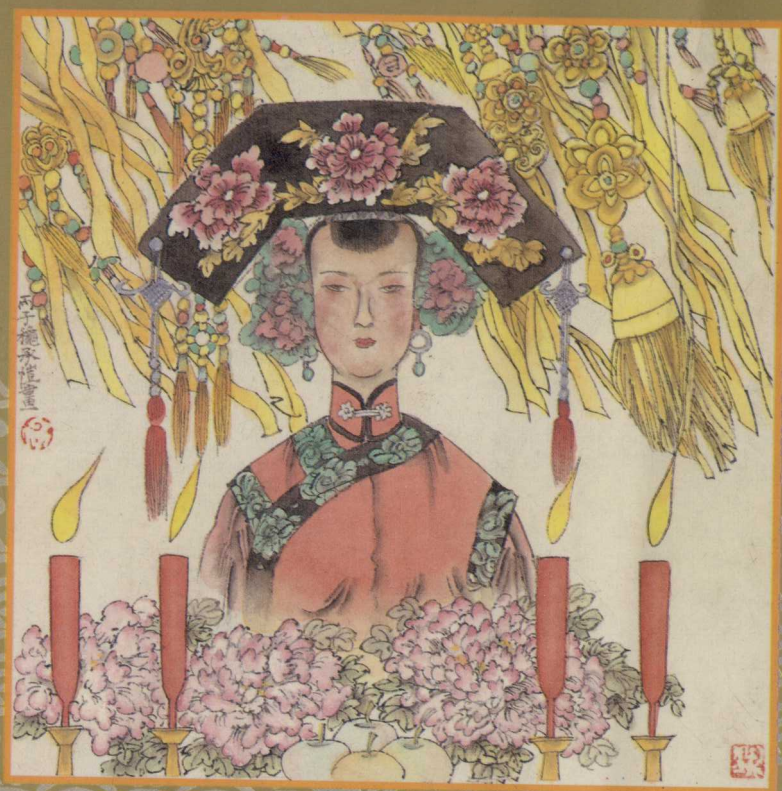


中国古代历史演义小说丛书

珍本



清史演义

(上)

珍本中国古代历史演义小说

陆士谔 著

刘大军

喻爽爽

宋朝仪

校点

清史演义

(上)

群众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北京

珍本中国古代历史演义小说

总 序

侯忠义

一、史传与历史演义

中国古代小说，源远流长，从题材上来说，可分为三大主流，即：神怪小说、历史小说、世情小说。其中历史小说，顾名思义，当指以历史史实和历史人物为题材的小说。

先秦时期的《穆天子传》，写西周穆王姬满，西游昆仑，会见西王母的故事，可以视作历史小说的萌芽。《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周考》、《青史子》等，可谓文言笔记体历史小说的开始。唐、宋、元出现的讲史平话，是历史小说的一大飞跃，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胚胎和雏形。元末明初，罗贯中创作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犹如一声春雷，宣告了历史演义的诞生。从此，历史演义就成了我国古代历史小说的主要撰构形式之一。

“演义”，又作“衍绎”，即“衍绎史传”之意。所谓“按鉴演义”，就是彰明按史实敷衍故事；书名又曰“通俗”，是表明文字等与史书的不同。由《三国志通俗演义》首先使用的“演义”一词，就体现了历史演义小说内容与形式上的特点。明·杨尔曾《东西晋演义·序》说：“一代肇兴，必有一代之史，而有信史，有野史，好事者聚集而演，以通俗谕人，名曰演义。”明·陈继儒《唐书志传·序》也说：“演义，以通俗为义者也。”明代著名作家袁宏道在《东西汉通俗演义·序》中，说了相同的意思：“文不能通而俗可通，则又通俗演义之所由命也。”这些话表明，历史演义无不标榜以“通俗”的形式来演义历史。其实这种“通俗”，是建立在对历史真实性极高要求的基础之上的，而史传正是演义小说内容上的主要依赖和根据。因此，明人把演义小说看作是可以“与经史并存”（陈继儒《列国志传·序》）的“羽翼信史”（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之作，把演义小说当成了通俗的历史读本。这一点，《三国志通俗演义》表现得最为突出。如果没有陈寿的《三国志》，《三国志通俗演义》便无从谈起。《三国志通俗演义》署“晋平阳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就说明了《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罗贯中自诩此书是从《三国志》演义而来。又如记隋唐间历史与人物的《隋唐志传通俗演义》，也明确宣布作者是广采史传编成的。林翰在其《序》中说：“遍阅隋唐诸书所载英君、名将、忠臣、义士，凡有关风化者悉为编入，名曰《隋唐志传通俗演义》。”至于冯梦龙《新列国志》

的成书，就更为典型。吴门可观道人《序》云：（《新列国志》）“本诸《左》、《史》，旁及诸书，考核甚详，搜罗极富，虽敷衍不无增添，形容不无润色，而大要不敢尽违其实，凡国家之兴废存亡，行事之是非成毁，人品之好丑贞淫，一一胪列，如指诸掌。”肯定了据史传编撰演义小说的历史真实性。同时，也应当指出，成功的演义小说，它绝不是历史著作的重复和简单的移植，而是作者以自己的艺术才能进行的再创作。这表现在：精心剪裁、取舍材料，结构成首尾完整、脉络清楚的完整故事；增饰情节，细绘场景，渲染人物；将简练、质朴的文言文，改成群众化的通俗语体文等。当然演义小说作家的贡献远远不止这些，但它已充分说明，史传不等于演义小说，演义小说是对史传的再创作，也只有如此，才能满足读者对演义小说的审美追求。

二、历史演义的产生与发展

史传著作对历史演义无论从题材来源、结构形式、编撰方法，其中包括以人立传、按年记事的写法，以及精彩的语言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提供了借鉴外，其他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话本戏曲，都与历史演义有着因缘。尤其是讲史平话，它与历史演义都是从史著中滋生出来，可以说是同宗异派，由于话本成书在前，演义成书在后，演义又从平话中吸取了营养和借鉴。如在南宋说话艺术中，就有“讲史书”一家，“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战争之

事。”(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平话小说是从说话中逐渐分离、独立起来的文人创作的讲史小说。鲁迅说:“宋人说话之影响于后来者,最大的莫如讲史。”(《中国小说史略》)并认为:“后之章回小说如《三国志演义》等长篇的叙述,皆本于讲史。”(《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应该承认,讲史平话小说对历史演义影响巨大,它们简直就是最初的章回体小说。表现最明显的,莫过于《三国志通俗演义》。《元刊全相三国志平话》就是它的雏形。

《三国志平话》近六万字,到《三国志通俗演义》已达八十多万字,不仅作品的真实性大大提高了,内容无疑也更加丰富。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准确地比较了两者之间的重要区别说:“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若东原罗贯中以平原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三国志通俗演义》不过是删除了《三国志平话》中的荒诞不实之处,却无法否认《平话》与《演义》之间的联系,和《平话》对《演义》成书所做的贡献。如《三国志平话》共有六十九节插图标题,其中有二十八节为《演义》直接吸收。《平话》已有了统一的连贯情节,这便是《演义》的情节基础。《平话》中的主要人物诸葛亮、张飞、关羽、刘备、曹操,仍然是《演义》中的主要人物。如《演义》保留了《平话》中诸葛亮神机妙算、足智多谋的一面,尽量削弱其鲁莽刚武、

仙风道骨的一面,使之更接近历史人物。《平话》中的主要情节,主要是写刘、曹集团的矛盾和斗争,以颂扬刘、关、张为主,很少写到东吴。《演义》通过进一步的构思,在《平话》的基础上,增加了大量有关东吴的内容,使魏、蜀、吴三家军事力量与矛盾斗争,得到了充分、均衡地反映。特别是《演义》突出了曹操的形象,是一大进步。同时,《演义》接受了《平话》的爱憎倾向。《平话》在流传中带来的强烈的是非感、爱憎感,以及幽默诙谐的格调等,都为《演义》的创作提供了基础。又如《前汉书平话续集》之与《两汉开国中兴传志》、《武王伐纣平话》之与《列国志传》,都可以明显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列国志传》的前两卷,主要沿袭《武王伐纣平话》的细节描写,神魔怪异色彩十分浓厚;而对战争场面描写,又具有明显平话风格。如艺术上全用白话描摹,比喻形象、生动,音韵抑扬顿挫,节奏感很强等,就是保持了平话的特点。至于平话中的分卷立目的形式,用作评论的诗赞韵语,都为长篇章回体演义小说的最终形式,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毋庸置疑,元末明初是从讲史平话向演义小说的蜕变时期。演义小说的创作始于罗贯中。他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对演义小说的创作,无论内容与形式都起到了典范的作用。罗贯中是一个多产的作家,除《三国志通俗演义》外,尚编有演义小说《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十七史演义》等。明代中期,在《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影响下,随着经济的发展、思想的活跃、科技的进

步、印刷事业的兴盛，演义小说的创作一片繁荣。正如吴门可观道人在《新列国志·序》中所云：“自罗贯中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汪洋百余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颦日众，因而有《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瀚几与正史分签并架。”林翰在《隋唐志传通俗演义·序》中也说：“罗贯中所编《三国志》一书，行于世久矣，逸士无不观之。而隋唐独未有传志，予每憾焉。”强调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开创之功，并把《隋唐志传通俗演义》看作是踵武《三国志通俗演义》之作。

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后，接着产生了模仿罗氏之作的演义小说《列国志传》（余邵鱼）。此书以武王伐纣为开端，记叙春秋列国故事，体例、风格绝类罗贯中。余氏对演义小说的精刊与倡导，鼓舞起书贾的热情和读者的兴趣，而文人亦以创作此类小说来寄托各自的情怀，于是掀起了一股演义小说创作热。明中叶嘉靖至万历前后，新创与改编的演义小说不下二十余种，蔚然成风。比较重要的，有熊大木《南北宋志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甄伟《西汉通俗演义》，谢诏《东汉演义传》、《全相按鉴演义东西汉志传》，无名氏《承运传》，杨尔曾《东西两晋志传》等。明末至清中叶，是演义小说创作的又一高潮时期，且作品出现了系列化的趋势。明末补订和续作的有冯梦龙《新列国志》、吴门啸客《孙庞斗志演义》、徐震《乐田演义》（即《前后七国志》）；取近事加以敷衍的

如《英烈传》、《续英烈传》。而补缺之作，如周游的《开辟衍绎通俗志传》、钟惺（伯敬）的《盘古至唐虞传》、《有夏志传》、《有商志传》，以及清人杜纲的《南史演义》、《北史演义》，吕抚的《二十四史通俗演义》等。清中叶以后演义小说的沉寂和衰微，与当时的政治形势与文化专制有关，但近代出现了蒙古贵族尹堪纳希所撰元朝勃兴历史的《青史演义》，清末陆士谔反映清代全史的《清史演义》等。古代的历史演义小说，几乎涉及了整个中国社会全部朝代和重要史实，简直就可以构成一部中国历史的“形象”教材。“五四”以后，作为古代历史演义小说的余响，尚有新作出现，如蔡东藩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钟毓龙的《上古神话演义》、许啸天的《唐宫十二朝演义》、李伯通的《唐宫历史演义》、林汉达的《东周列国故事新编》等。

三、历史演义的特点

以《三国志通俗演义》为代表的历史演义小说，从它诞生之时起，就已经基本形成了区别其他历史小说的类型特征，这些特征表现为：内容的真实性、语言的通俗性和形式上的章回体。

内容的真实性，体现了演义小说反映历史的可靠性和合理性。正如明代高儒在《百川书志》中评《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时所说，是“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尚好，非俗非虚，易观易入，非史氏苍古之文，去瞽传诙谐之气，

陈叙百年，该括万事。”演义小说并不排斥虚构，但它的主要情节却是从史实出发，历史的纪实性，远远超过了作者的想象和虚构。也就是说，历史演义的作者的想象是有限的，虚构是受历史制约的，只能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适当地运用集中、夸张、熔裁等艺术手段。作者的态度是冷静、客观的，对人物的刻画和褒贬是以历史为根据的。由于小说的情节是以历史时间为线索，所以即使是细节的渲染和增饰，亦与历史的真实时间相符。历史演义题材上的这一基本特征，使它与以虚构为主的记人物传记的英雄传奇小说，如《水浒传》、《杨家将通俗演义》、《隋史遗文》等明显不同，后者是属于历史小说的另一种类型，这是应该加以说明和区别的。

历史演义小说保持着通俗特色。通俗之意，一方面是表示演义小说浅显易懂，文字通俗晓畅，精炼优美；一方面还要求作品内容具有移人性情的作用，富有艺术感染力。正如甄伟在《西汉通俗演义·序》所说：“（演义小说）虽俗而不失其正，义虽浅而不乖于理；……使刘、项之强弱，楚汉之兴亡，一展卷而悉在目中，此通俗演义所由作也。”正由于演义小说不仅“据正史”，还要“采小说”、“野史”，即吸收传说逸闻，以补正史之不足，这种带民间色彩的内容本身，就产生了“通俗”的作用，丰富了“通俗”的内含，这是演义小说不容忽视的特点。

《三国志通俗演义》首创古代小说长篇章回的体裁。历史演义所采用的章回体，是在平话和史传两方面影响

下形成的。“讲史”由于内容丰富，人物众多，情节复杂，势必要分回讲说；平话作为书面形式的读物，也就按照古代图书的形式，分卷分篇叙述。通俗演义保留了这个特点，以此作为“通俗”的特色之一。另一方面，章回体的形成也和编年体、纲目体等史著体裁有一定的关系。小说中的分卷、分回，其作用与史书按年分卷标目，是完全相同的。章回体的叙事模式，打破了平话单线发展的情节结构，而采用了头绪众多的叙事模式，无疑是我国古代小说艺术上的一个进步和发展。

至此，我们对历史演义小说的概念，可以下这样的界定：

一、以叙一朝或几代的历史为主要内容，多以正史编年为序；

二、以帝王将相为主要人物，以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为主要情节；

三、成书过程为世代累积型，大都有所借鉴和依托；

四、采用长篇章回体体裁，编年与纪传相结合的叙事方法；

五、叙述语言多用文、白相间的浅近的文言，人物对话也偶用白话。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对历史演义的界定，是对这一小说类型的特点归纳、综合的结果，并不是说每一部历史演义都具有上述的特点；同时，也不能把这些类型特点绝对化，看成是一成不变的框框，某一类型可能被突破，不同

类型之间也可能互相影响。我们这些意见，目的只在于帮助读者了解和认识这一类型的作品而已。

四、历史演义的艺术与价值

修髯子在谈到《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用与影响时说：“史氏所志，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非通儒夙学，展卷间，鲜不展思困睡。故好事者，以俗近语，隐括成编，欲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作为形象的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在普及历史知识的同时，也产生了相应的教育作用。史传的目的在于“资治”，演义的目的在于满足人们的审美追求。演义小说也是艺术。在“衍绎史传”、不违背历史真实的情况下，对历史人物的描写刻画，对历史事件的敷衍润色，成为判断演义小说艺术水平高低的重要依据。“其描写摹神处，能令人击节起舞。即平铺直叙中，总属血脉筋节，不致有嚼蜡之诮。”（《新列国志·凡例》）历史演义小说同样不能漠视作品所应有的愉悦功能和读者的审美期待。

我们本着这个目的，编辑了这套《中国古代历史演义小说丛书》，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欢迎。

一九九五年岁末，
于北京大学燕北园。

前 言

《清史演义》六集二十四卷一百二十回，是近人陆士谔所撰写的现知最早的一部清代全史小说。

陆士谔（1878—1944），名守先，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早年曾在青浦、上海一带行医。因为没有名气，前来就诊的人很少，生活难以维持，于是转以租书为业。在此过程中，逐渐对小说产生兴趣，并在研读之余尝试写作。书稿投至报社，竟被采用，从此专以小说创作为正业，由短篇而中篇、由中篇而长篇、由连载而单行，在当时的小说界中颇有名气。二十年代中期，陆士谔结识小说界名人孙家振（海上漱石生）。孙氏得悉他曾习医，遂劝他在自己所设的上海图书馆（属书局性质）中应诊，并在所办的《金刚钻报》上为之宣传，刊载陆氏撰写的医学文章。此后，陆士谔逐渐成为上海名医，在小说创作的同时，尚撰有不少医学著作。

陆士谔所创作的小说题材甚广，数量亦多，如改良小说《新中国》，谴责小说《新上海》、《六路财神》、《最近社会秘密史》，历史小说《清史演义》、《顺治太后外记》、《女皇秘史》、《清朝演义》、《清朝开国演义》，艳情小说《龙华会之怪现状》、《女界风流史》，武侠小说《飞行剑侠》、《黑侠》、《红侠》、《八大剑侠》、《雍正游侠传》、《七剑三侠》、《血滴子》、《江湖剑侠》、《今古义侠奇观》、《北派剑侠全书》、《南派剑侠全书》，以及科幻小说《新野叟曝言》，荒诞小说《新水浒》、《也是西游记》等。其所创作的小说不下数十种，从数量上说，在当时诸小说家中只有吴沃尧可以与之相埒。但陆氏所创作的小说今天大部分已失佚不存，即使存世的，其复本量也很少。

这部《清史演义》大约创作于1913年初或更早一点，其时距清朝灭亡仅一年多。小说最初由《神州日报》连载，后因索阅全书者甚多，乃由神州日报社与陆士谔商定，先将一、二集交由上海大声图书局出版单行本，其余遂写遂刊遂出单行。到1916年初，全书六集全部出版完毕，其间不断再版发行，在当时影响甚大。按陆氏最初的设想，这部《清史演义》全书共六集一百二十回，内容包括从清代发祥到宣统逊位间共二百九十七年之事。但实际写到第六集第一百二十回时，仅叙至日俄战争结束、《中英西藏条约》签定及立宪运动开始，约在1906年间，其后内容，言明“且待下集书中再行演讲。”但这部

“下集”即第七集今已难觅，是否写出也无从查考。

在这部《清史演义》完成后的五、六年里，作者又陆续写出了《清朝演义》及新版《清史演义》。其中《清朝演义》约三十余万字，新版《清史演义》约二十余万字，字数都较此书少一半以上。据作者在新版《〈清史演义〉序》中介绍：“《清史演义》注意在宫闱秘闻、朝野逸事，《清朝演义》注意在国故朝章、大经大典，而本书（指新版《清史演义》）则于秘闻国政虽未尝弃置，而于名将之战绩、世潮之变迁尤三致意焉。”由此可见这三部书的写作旨趣及重点的不同。

从这部《清史演义》的写作内容及思路上看，它很可能是取材于清代编年通史历朝《东华录》，同时也参考了不少清代的笔记杂史及民间传说。这就使得此书既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又具有很强的通俗性及可读性，是一部雅俗共赏的演史小说。在布局结构上，作者并没有按照年代去平铺直叙，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有所侧重，有所取舍，较为成功地凸现了清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及流传较广的民间传说。在小说中，清代各帝所占章回数大致如下：清太祖在位十一年，约占二回；清太宗在位十七年，约占五回；顺治帝在位十八年，约占十三回；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约占五回；雍正帝在位十三年，约占六回；乾隆帝在位六十年，约占八回；嘉庆帝在位二十五年，约占十二回；道光帝在位三十一年，约占十五回；咸丰帝在位十一年，约占十六回；同治帝在位十三

年，约占五回；光绪帝在位三十四年（此书只写到光绪三十二年），约占三十三回。其中顺治、道光、咸丰、光绪都是清朝的多事之秋，它们时间虽不长，但在小说中所占回数却最多，作者的这种安排应当说是成功的。

在艺术手法上，作者最善于用一种客观的白描写法去刻画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虽不直接褒贬，但读者自可从其语言中看出端倪。如第四集中描写浙江巡抚刘韵珂，在总督裕谦抗英失败后，他当着众人的面侃侃分析失利的原因，别人问他，“‘大帅当时既然有此特见，当时何不知照裕帅？’刘韵珂道：‘彼时我也没有想到。’”（第四集第一回）。当钦差大臣奕经攻英失败后，他上了一道“十可虑”的奏折，“把浙江情形说得非常危险，却并无一辞半语说及‘和’字。”这样既可不冒抗英的风险，又可避免言和而触犯众怒（第三回）。此外，对于受冤的抗英英雄姚莹他十分理解同情，私下里并大发牢骚；而对于因逃跑投降而获罪的余步云，他也能以礼相待。经作者不露痕迹的一番描写，一个轻圆流滑、老于官场的封建官僚形象跃然纸上。

由于这部小说最初是随写随刊的，因而在布局上难免存在着一些不足，如康、雍、乾三朝是清代的盛世，清代的疆域及制度都是在这—时期奠定的，其间发生过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而小说在这—段时间里却着墨不多，尤其是康熙朝，六十一年史事仅用五回来描写，且仅简单地叙述了康熙初年的三藩之乱、平定台湾及宫闱秘

闻，然后便是康熙末年的立嗣之事，对康熙中期及后期的史事则几乎没写，鳌拜专权、平定准部等重大历史事件更是只字未提，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由于历史的局限，本书作者把太平天国、捻军、义和团等起义军，一概诬为匪类，这一点，请读者在阅读时予以注意。

这次校点，是以上海大声图书局出版的单行本为底本进行的。书中有一些明显的错字，在整理时径加改正。不妥之处，敬盼赐教。